

海外中国
研究丛书

刘东主编

西學東漸と中國事情

西学东渐与中国事情

〔日〕增田涉 著

由其民 周启乾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海外中国
研究丛书

刘东主编

西学东渐与中国事情

〔日〕增田涉 著

由其民 周启乾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学东渐与中国事情/[日]增田涉著;由其民,周启乾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8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刘东主编)

ISBN 978-7-214-06415-8

I. ①西… II. ①增… ②由… ③周… III. ①文化

交流—研究—中国、日本—19世纪 IV. ①G1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60934 号

SEIGAKU TOZEU TO CHUGOKU JIJO(西學東漸と中國事情)

By Wataru Masuda(增田涉)

© 1979 by Kyo Masuda

First published 1979 by Iwanami Shoten, Publishers, Tokyo.

The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n 2010 by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Nanjing

by arrangement with Kyo Masuda c/o Iwanami Shoten, Publishers, Tokyo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10-2010-414

书 名 西学东渐与中国事情

著 者 [日]增田涉

译 者 由其民 周启乾

责任编辑 沈 亮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60×1304 毫米 1/32

印 张 8.25 插页 2

字 数 214 千字

版 次 2010年11月第1版 2010年1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6415-8

定 价 23.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序“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中国曾经遗忘过世界,但世界却并未因此而遗忘中国。令人惊讶的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就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各国的中国研究却得到了越来越富于成果的发展。而到了中国门户重开的今天,这种发展就把国内学界逼到了如此的窘境:我们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必须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不仅必须向国内读者译译海外的西学,还必须向他们系统地介绍海外的中学。

这套书不可避免地会加深我们150年以来一直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因为单是它的学术水准也足以提醒我们,中国文明在现时代所面对的绝不再是某个粗蛮不文的、很快就被自己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一个高度发展了的、必将对自己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可正因为这样,借别人的眼光去获得自知之明,又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历史使命,因为只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去透过强烈的反差反观自身,中华文明就找不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

当然,既是本着这样的目的,我们就不能只从各家学说中筛选那些我们可以或者乐于接受的东西,否则我们的“筛子”本身就可能使读者失去选择、挑剔和批判的广阔天地。我们的译介毕竟还只是初步的尝试,而我们所努力去做的,毕竟也只是和读者一起去反复思索这些奉献给大家的东西。

刘 东

1988年秋于北京西八间房

本书翻译出版得到
日本国际交流基金资助

译者的话

本书中译本曾以《西学东渐与中日文化交流》为题,于1993年首次出版,惜至今已经绝版多年。当年热心向国际交流基金推荐申请翻译出版资助的吴廷璆、大庭脩先生,以及主要译者由其民先生,也已相继辞世。作为后来者,深感有责任让它流传久远,以不负此书的学术价值和前辈学者的隆情厚谊。

时隔近二十年之后,幸得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刘岳兵博士热心推荐,刘东教授慨允将本书纳入他所主编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使本书得以再度与中国读者见面,继续为中国事情发挥作用,当可告慰包括原著者在内的诸位前辈学者于九泉。

关于本书的学术特色与中译出版的缘起,请参见《1993年版中译本前言》,兹不赘述。这次付印前,又与日文原书及初译本核校一过,在可以辨识的范围内,径直改正了其中的误植。由于水平所限,不周之处仍在所难免,敬希读者不吝指正。

刘岳兵博士不辞辛劳,居间联系协调岩波书店、江苏人民出版社及译者诸方面,大力促成了此事的顺利进行。作为译者之一,谨对刘东教授、刘岳兵博士及中、日相关出版机构表示衷心的感谢!

周启乾

2010年6月1日于天津

1993 年版中译本前言

日本著名学者增田涉先生(1903—1977)的名字,对于中国学术界和广大读者来说并不陌生。早在本世纪 30 年代初期,增田即来到我国最大的城市上海,跟随鲁迅先生学习中国小说史及现代文学,并撰有《鲁迅传》在日本杂志上发表。他返回日本后,继续就教于鲁迅,相互间书信往还不断,直至鲁迅辞世。此后,增田参与日本“中国文学研究会”的建立和《大鲁迅全集》日文版的筹划与翻译出版,致力于把鲁迅及其著作介绍给日本读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增田先后在日本多所著名大学执教,讲授中国文学和鲁迅著作,为增进中日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推动学术文化交流,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这是已经为广大中国人民所熟知的事实,兹不赘述。

中国读者较少了解的,则是本书所反映出的增田学术的另一侧面,即对于近代与前近代时期西学东渐和中国事情史的精湛研究。如所周知,日本在 1868 年明治维新后结束了封建的幕藩体制,迅速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日本正是通过向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实现了从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的转变。如果说,在古代的中日关系中,主要是日本向先进的中国学习,那么,到了近代,局面则为之一变,对迅速崛起

的东邻日本,中国的有识之士提出了“以日本为师”的口号,影响及于广泛的阶层。迫于形势的发展,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也不得不下诏实行“新政”,以日本为模式进行多方面的改革。大批留学生东渡,更形成了学习日本的热潮。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日本吸收和接受西方资本主义学术文化的过程中,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就是说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许多西方学术正是通过中国而传入日本的。以往,中国的这一媒体作用常被忽视而未予应有的注意,本书作者则独具慧眼,以其深厚的功力,广泛挖掘日中两国典籍,乃至稗官野史,剔抉梳理,考订鉴别,以充分的史实说明日本在这方面同样深受惠于中国。

19世纪以来,处于封建社会晚期的中、日两国,都面临着“西力东渐”即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挑战,西方殖民者力图打开中、日两国的大门,将其纳入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西方列强的对华侵略活动,震惊了只有一水之隔的日本朝野,引起了他们的极大关注。中英鸦片战争的消息给日本敲起了警钟。众多汉译西方著作和中国有识之士所著睁眼看世界的作品传入日本,被广泛阅读,成为了解世界大势的精神食粮。幕末维新志士从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为明治维新作了思想上的准备,中国的地大物博和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爆发,吸引了西方国家的注意力,也为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和客观条件。明治新政府的领袖运用来自汉译书籍的知识,与欧美使节樽俎折冲,明治初期使用汉译西书作为各级学校的教科书和参考书。从一些重大事件直至逸闻花絮,书中都有生动翔实的记载与说明。

事实表明,中日两国面对外来压力所作出的反应颇为不同。例如,魏源《海国图志》成书后,不仅迅速传入日本,而且被广泛翻刻、训点乃至日译,版本多达20余种,流行程度和发挥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中国本国。日本的当政者和有识之士为避免重蹈中国的覆辙,积极提倡海防,奋起御敌。如果说,幕末志士佐久间象山标榜“东洋道德,西洋艺术(技术)”,

希望在学习西方技艺的同时维持原有的制度与道德,反映了他在认识上的局限性,那么时隔不久,明治维新的功臣们就超越了他们的前辈,在日本建立起新的政治经济体制,并公开声称“脱亚入欧”,跻身西方列强的行列。在日本维新成功 30 年之后,中国始出现要求维新的“戊戌变法”,但仍不能见容于最高统治者而遭无情镇压。这时提出“中体西用”,更是为时过晚,已完全不能阻挡列强的瓜分。至 20 世纪初,无论中国封建统治者的“新政”,抑或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民国”,同样都未能摆脱半殖民地的命运。在历史的长河中,30 年是短暂的一瞬,而一旦失去机遇,即会招致无可挽回的损失。

本书原名《西学东渐与中国事情——“杂书”札记》,是作者运用多年精心搜集和珍藏的书籍,加以比较研究而写成,娓娓道来,如数家珍,对于中国文化的眷恋之情溢于言表,我们从中可以充分感受到,中日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确实源远流长,相互影响无所不在。在中日关系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今天,完全有理由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够继往开来,把文化交流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我于 1981 年第一次赴日时即接触到这本书,深为其内容所吸引,体味到它的学术价值,亟愿介绍给国内学术界。然而,鉴于学术著作出版困难的局面,这一想法当然不易实现,只能暂时搁置下来。近年,美国圣巴巴拉加州大学历史系教授傅佛果先生(J. A. Fogel)将本书英译,在他主编的《中日研究》上连载介绍给了西方读者。承傅佛果教授惠赠,我们又读到了这本书的英译文。当时的心情,与其说是兴奋,不啻是受到极大的震动和鞭策。这样一部有关中国事情史的好书,难道不应迅速出版中译本,介绍给我们的学术界吗?我把此书拿给我所由其民先生阅读,他同样高度评价其学术价值,并愿意着手汉译。其民先生早于 30 年代即曾留学日本仙台东北帝国大学。卢沟桥畔的枪声召唤他毅然中断学业,束装归国,投身抗战。如今,他虽届高龄,依然笔耕不辍,一举译出初稿,我则作了一些“填平补齐”的工作。可以说,这是一次愉快的合作。

译稿完成后,承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名誉所长吴廷璆教授和日本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所长大庭脩教授热心推荐,获得日本国际交流基金 1993 年度翻译出版资助。对于中译本的出版,原出版者岩波书店提供了方便。天津社会科学院院长、院出版社社长王辉教授等给予关照。国际交流基金驻华代表小熊旭先生寄予关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冯佐哲教授在百忙中代为查核罕见资料,校订了部分引文。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冯承柏教授惠予阅览的便利。凡此种种,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我们衷心希望本书的出版能为繁荣中日两国的学术文化交流作出贡献,也期待学术界对于本书中提出的一些问题作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

为便于阅读,根据需要作了译注。所引中日汉文旧籍本应一一查核原文,但限于条件,未能全部做到,只能从日语译出。原书中的书影插图从略。译文中的不妥之处,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周启乾

1993 年 8 月

于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目 录

译者的话	1
1993 年版中译本前言	1

第一部

日中文化关系史的一面	3
1. 《万国公法》与医学书	3
2. 科学书	8
3. 《智环启蒙》等书	12
4. 地理书	16
5. 《海国图志》、《圣武记》等书	23
6. 松阴与魏源	27
7. 鸦片战争与《道光洋艘征抚记》	32
8. 《鸦片传闻书》	36
9. 鸦片战争对日本的影响	41
10. 《夷匪犯境录》与《鸦片始末》	45
11. 斋藤竹堂的《蕃史》及其他	50

12. 佐藤信渊《海陆战防录》、《存华挫狄论》	55
13. 鸦片战争异闻	62
14. 岭田枫江《海外新话》及其他	67
15. 《清英战记》问题以及《圣武记》的翻刻与 荷风《下谷丛话》	72
16. 《云南新话》与“太平天国”读物	78
17. “小刀会”和小说《满清纪事》	85
18. 《满清纪事》与《粤匪大略》	89
19. 《外邦太平记》与《新说明清交战记》	94
20. “太平天国”传说与大盐平八郎	99
21. 对洪秀全的各种描述	110
22. 《盾鼻随闻录》的问题及有关太平天国的杂记	119
23. 《宽永小说》与《日本乞师纪》	128
24. 乞师颠末	136
25. 萨摩、倭寇与中国(明)	146
26. 朝鲜战役中的萨摩和中国(明)	154
27. 郑成功与“国姓爷”	161
28. 《明清斗记》与郑成功传	171

第二部

日本开国与鸦片战争	183
《满清纪事》及其著者 ——关于我国所传的“太平天国”	191
山本 宪(梅崖)	220
编者后记	242

第一部

日中文化关系史的一面

1. 《万国公法》与医学书

毛泽东在他的《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一文中说:“自从 1840 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按原书所引,录自《毛泽东选集》合订本,1358 页。——译者)

清朝初期,雍正皇帝对基督教采取了禁教政策;但清朝末期,根据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解除了教禁,于是,众多外国教士来到中国。他们在传教的同时,进行了西方学术文化的介绍这样一种启蒙活动。所以中国老早就有了各类西洋书籍的汉文译述的传教著作。这种汉文译述和著作,主要在上海等地出版。至于具体书名和译述者姓名,梁启超制有详细的《西学书目表》(光绪二十二年序刊)。以前,拙著《中国文学史研究》([日]昭和^①四十二年第一版,岩波书店)一书,已予全部转载。

^① 文中凡初次出现的日本年号均加[日]字,以示区别。昭和时期为 1926—1989 年。——译者

中国人士目睹鸦片战争以来的迭次战败,在沉痛反省自己国家和本国文化缺点的同时,通过大量出版西方学术、文化的汉文译述,在思想上也产生了变革国家体制的倾向。这些启蒙读物,成了从古典中国向现代中国进行体制变革的桥梁。

这些经外国教士之手,在清末中国出版的汉文“西学”书籍,很快被引入我国。由幕末到[日]明治^①初年,将之加注训点^②翻刻出版的不在少数。这些读物对于我国,也成为西洋所开发的新知识的供给源泉。可以说,在从幕末到明治时期为求体制改进而进行的启蒙活动上,它们同样也起了不小作用。

我之所以对这些中国书籍及其引入我国的翻刻本怀有兴趣,我想是由于阅读了故中山久四郎《近代中国对维新前后日本的各种影响》(昭和四年,史学会编,富山房出版的《明治维新史研究》刊载)一文的缘故。由于我早就关心日本与中国的关系(尤其在文化方面),对于这类翻刻书籍,从史料意义出发,目之所及无不尽量搜集。这二三十年间,不断购求,现在愿就案头所藏,略陈数语:

《万国公法》(共4卷)。此书是美国教士丁韪良(W. A. P. Martin)翻译的美国学者惠顿(Wheaton)原著《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的汉文本。丁韪良于道光三十年(1850)渡华,先任北京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教习(即教授),后任校长。我收藏的汉文原译本,是同治三年(1864)“京都崇实馆存板”(此处的京都指北京)。另外,我还藏有[日]庆应元年(1865)幕府时期“开成所”^③翻刻并加训点,附有人名、地名读音的6卷本。^④到了明治时期,这一刻版还有所增印(东都^⑤老皂馆,万屋兵四郎发行)。

① 明治时期,1868—1912年。——译者

② 训点,指为按日本固有语音阅读汉文而加注于汉文的字母(假名)及标点;也包括“送假名”(起活用语尾、助词、助动词作用的符号)和“返点”(起语序倒顺指示作用的符号)。——译者

③ “开成所”,幕府设立的专授英、法、德、俄、荷兰等国西学的学校。明治元年改称“开成学校”,后为“东京帝国大学”,战后才为“东京大学”。——译者

④ 此书未载训点者之名,但据《日本洋学编年史》(大概如电原著,佐藤荣七增订,昭和四十年,锦正社出版)指称,是西周助(周)。

⑤ 东都,江户时代(1603—1867)指东京。——译者

《万国公法释义》(4册)。是堤穀士志混合了汉字与日语字母译为日文的(但止于第2卷),庆应四年(即明治元年),京都发行。

《万国公法蠡管》(8册)。是“高谷龙州注解,中村正直批阅”的,明治九年东京府发行。有训点并收录了与内容有关的汉文注释,是一种大版、大字的出色版本。

以上所举,仅限于我所收藏的范围。此外,据说明治三年鹿儿岛藩出版有重野安绎译述的《日译万国公法》(但以第一卷的第一章、第二章为止)。又据说,明治十九年还有山田谨一郎的训点本。

《万国公法》一书何以如此备受欢迎和重视呢?原来从幕末到维新,我国在种种方面同世界各国的交涉折冲问题突然增多;此际,拥有万国公法即国际法知识就成为当务之急。而由于有关这方面的知识,我们以前迄无所知,这部汉译国际法书籍,便成了唯一的宝典。据说先觉者坂本龙马^①为要在土佐翻刻此书,就曾在出版资金方面竭尽其力。特别在维新之后的明治政府转向开国政策(即开放政策——译者)之际,《万国公法》一书被当局视如经典。明治三年制定大学规则时,科目中就列有“万国公法”一项。明治四年,京都小学校的课程中也有“万国公法”。此外,各地学校还把《万国公法》采用为参考书。关于此节,前举中山久四郎的文章和尾佐竹猛的文章《万国公法思想的引进》(昭和七年,共立社书店《近代日本国际观念的发展》刊载)中都曾提到。

今天,我们使用的“权利”、“义务”等词,据认为就是来自《万国公法》的。而瞥一下该书的目录,也可以看到它已经使用了“自治”、“自主”、“主权”等语。据说,明治政府的外务卿(明治十八年以后改称外务大臣——译者)大隈重信,当与英、法外交官发生辩论时,便运用此书,纵横捭阖,常能制胜。关于这样的轶事,尾佐竹猛在他的《万国公法与明治维新》一文(昭

① 坂本龙马(1835—1867),江户末期著名尊皇倒幕代表人物,曾组织海援队,与西乡隆盛等策划恢复皇权。——译者